

国家与社会语境下的中国近代报刊分析

王 天 根

就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以报刊为核心的传媒无疑是面向西方、东方的窗口。通过传媒看世界,其结果往往取决于报刊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读者心态及其社会地位,也与报刊“把关者”的媒介素养等密不可分。对国人而言,清末民初面临政治转型,其时报刊无疑是近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对社会架构有重大影响。分析近代报刊功能,离不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调适。其时,“国家”多与现代性相伴而生,而“社会”与传统性密切关联,两者不仅有过紧张与对峙,也有断裂乃至错位。传媒在两者关系的弥合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近代政治与社会转型的侧重点显然不同,“国家重建”偏重政治意识形态,而“社会重构”关注社会秩序。面对国家与社会重构中各自的权限与职责,近代报刊多体现文人论政,办报旨趣偏重国家乃至意识形态,政治喉舌的认同显而易见,其呈现的媒介镜像多为政治派系意义上的主观“意见”,“意见”往往是政党、政客引领社会舆论的主流或潜在的价值导向。而近代报刊既为社会舆论平台,常有自己的取材标准,即坚持报道事实为本位,以客观、中立为取向。职业化的报人常强调传媒镜像是报道社会事实,这有目光向下的问题。在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中强调事实本位还是意见本位,以报刊为核心的大众传媒面临着政治抉择的同时,也参与政治建构。

近代传媒对政治的建构,涉及政治话语、政治传统、政治仪式及政治秩序等,其核心是对政治制度及其理念的重塑。清末民初的报刊以“通中外”、“达新知”为旨趣,广泛传播西方政治制度及其学理依据。近代政治学理有两种表达形式:中国传统政治学理的近代化,西方政治学理的中国化。报刊在培养读者的政治认同上,效果尤以“西方政治中国化”为显著。在大众媒介的传播下,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政治学成为政治转型的重要理论素养,这为近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准备了学理。综观中古社会,中国基本上“家”、

“国”同构,“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国家、社会基本联为一体。这从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奋斗哲学中即可窥见一斑。甲午战争日胜中败,报刊的反思尤以中、日政治制度优劣为主。日本的明治维新、俄国的彼得大帝改革等,成为晚清政治的实践参照。这些皆强调在国家、社会渐次分离的语境下进行政治改良。其时,政论性报刊以建构维新舆论为己任,从而为制度变革提供合法性。舆论精英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派人物已属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办报为南北舆论提供政治平台。以《时务报》、《国闻报》为核心的南北舆论平台,与维新共同体复杂的人际交往、人际传播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整体性联动的同时,也有传播偏好。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秉承中国传统的“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文人论政的传统,提出办报既要“博搜交涉要案”,又要“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准此行之,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兴,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渐备矣”(1896年《时务报》第一册)。《时务报》基本以“报馆有益于国事”为旨趣,侧重国内时评。《时务报》引发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与梁启超等办报理念密不可分。梁启超办报尤侧重“通上下”,实际上主张国内的政治改革,自国家至社会,民隐得以上显,血脉贯通,而不仅仅是上令下达。相比之下,通晓西学的严复等筹办《国闻报》,关注外交,侧重国家在世界的语境中的“通中外”,而不能闭关锁国;强调在西方政治理论的参照中推进政治维新。梁启超、严复等虽也主张对社会基础力量进行改造,但认为社会底层的民众还处在愚昧无知的状态,有待于思想启蒙。他们强调从民智、民德、民力等方面进行社会的重建。而民智、民德、民力等改造无疑是以国家政治改造为前提的,即社会改良以适应国家层面的政治维新。总体上看,报刊与维新政治的关系,梁启超有精辟的论述:“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道之故。”可见,报刊对开

通民智及国家富强之作用。一句话,甲午战后的政论性报刊尤以论证维新变法的合法性为旨趣。

相比之下,孙中山、胡汉民等革命者面对近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自称社会智识阶层,在报刊舆论中多以社会精英身份出现,主张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在社会变革、政治变革的道路选择上,孙中山领导下的《民报》与梁启超等筹办的《新民丛报》进行论战。革命者多从社会层面来审视国家政权的重建,在政治层面提出了“排满”等主张,后虽有只反对皇亲贵胄代表的满族专制提法,但多为思想策略,这是民族主义政治的要旨。面对社会底层民众的贫弱,他们提出了民生主张。孙中山等从理想状态层面比照了英国城市土地税的学理,对未来的民生涉及也有长远的谋划,但面对列强侵略,革命派主张保障农耕社会工业化的历程中民众赖以生存的基本权利。他们显然觉察到,近代君主专制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时代变迁,提出了国家需要重建、社会也需要重建的主张。孙中山等从法国大革命、美国的三权分立的建国原则中汲取了政治学养,认为国家层面的政治权力源自社会,提出了贯穿国家与社会两者关系的“民权”,这显然有别于君权神授论。革命派早期倾心政治舆论宣传,意在向社会基层灌输西方的政治学理,同帝王集权的国家意识形态作斗争。简言之,《民报》对三民主义鼓吹及其迂回宣传的政治语境,大体如此。

就政治变革而言,游离于中国社会传统的国家重建,无疑是漂浮在传媒幻象中的乌托邦。维新或革命语境下国家重建涉及政治学理的参照。面对社会秩序失范,不同政论报刊塑造不同的政治权威,灌输不同的政治建构理念,在开明专制或民主共和上有各自的抉择。近代中国或强调国家意识上的政治维新,或侧重社会底层意义上民生革命。面对政治功利,报刊与报人的关系日

益复杂多变。而西方政治学理参照下维新或革命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急速的更替,无形中也拉动传统社会在形式上的跟进。所谓学堂换成学校、衙门换成政府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就涉及到舆论监督,大众传媒的责任不言而喻。政治担当下传媒偏向及意见分歧,显而易见。不论是改良性报刊还是革命性报刊,皆坚持政治宣传上意见本位,侧重在政治舆论上建树,则是双方共同的路径。

总之,近代社会面临转型,传媒在国人的政治认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正如1918年符鼎升为徐宝璜的《新闻学》作序中称:“卢梭有言,国家者,人民同意所约成之社会也,既不能有脱离国家之社会,同时不能有遏抑民意之国家。果国家而遏抑民意者,其社会即得有借舆论之力,文字之灵,规讽而匡正之,以无舛民意为究竟。是故不出户牖,尽知天下所苦乐,此新闻事业之所权舆也。”(《符序》,肖东发、邓绍根编:《徐宝璜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即传媒作用涉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界定。近代报刊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适中维持怎样的尺度才算合理?对这一课题的探索需要学科交叉。将政治史与媒介史结合起来,从政治话语建构的层面分析清末民初办报高潮与维新或革命舆论的媒介建构等关系,这对清末民初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构的历史镜像的揭示及解读,颇有助益。而面对传媒呈现的历史镜像及当下媒介化社会的语境,如何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调适中重塑传媒角色,这是弥久常新的课题,尤值得当代学人关注。

收稿日期 2010—08—26

作者王天根,历史学博士,安徽大学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教授。安徽,合肥,230039。

【责任编辑 映雪】